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沉浸于求索之中

陶西平自选集

陶西平◎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HENJIN YU QUSUO ZHIZHON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沉浸于求索之中

BEIJING SHEKE MINGJIA WENKU

陶西平自选集



陶西平
◎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浸于求索之中:陶西平自选集/陶西平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12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ISBN 978-7-5656-1749-2

I. ①沉… II. ①陶… III. ①教育学—文集 IV. G4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308490 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CHENJIN YU QIUSUO ZHIZHONG

沉浸于求索之中

陶西平自选集

陶西平 著

项目统筹:杨林玉

责任编辑:佟旭

责任设计:王征发

封面绘画:王征发

责任校对:李佳艺

责任印制:何景贤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 000mm 1/16

印 张 37.75 插 页 1

字 数 447 千

定 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顾

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玉田 方玄初 石仲泉 李志坚 刘新成
江 平 汤一介 许 文 吴树青 何卓新
何兹全 宋贵伦 陈先达 欧阳中石 金冲及
郑必坚 逢先知 袁行霈 顾明远 徐惟诚
陶一凡 陶西平 黄枬森 龚育之 童庆炳
满运来 蔡赴朝 戴 逸

编 委 会 主 任 崔耀中 韩 凯

编 委 会 副 主 任 张文启 张兆民 孙向东 胡 越 杨生平
陈之昌 陆 奇 辛国安 糜 微 单允茹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王中江 尹 鸿 龙翼飞 卢颖华
叶培贵 白暴力 李 强 刘 伟 杨林玉
杨念群 吴国盛 陈平原 陈 来 陈雨露
郑红霞 赵汀阳 俞 斌 黄天树 黄泰岩
崔新建 彭 林 韩 震

出版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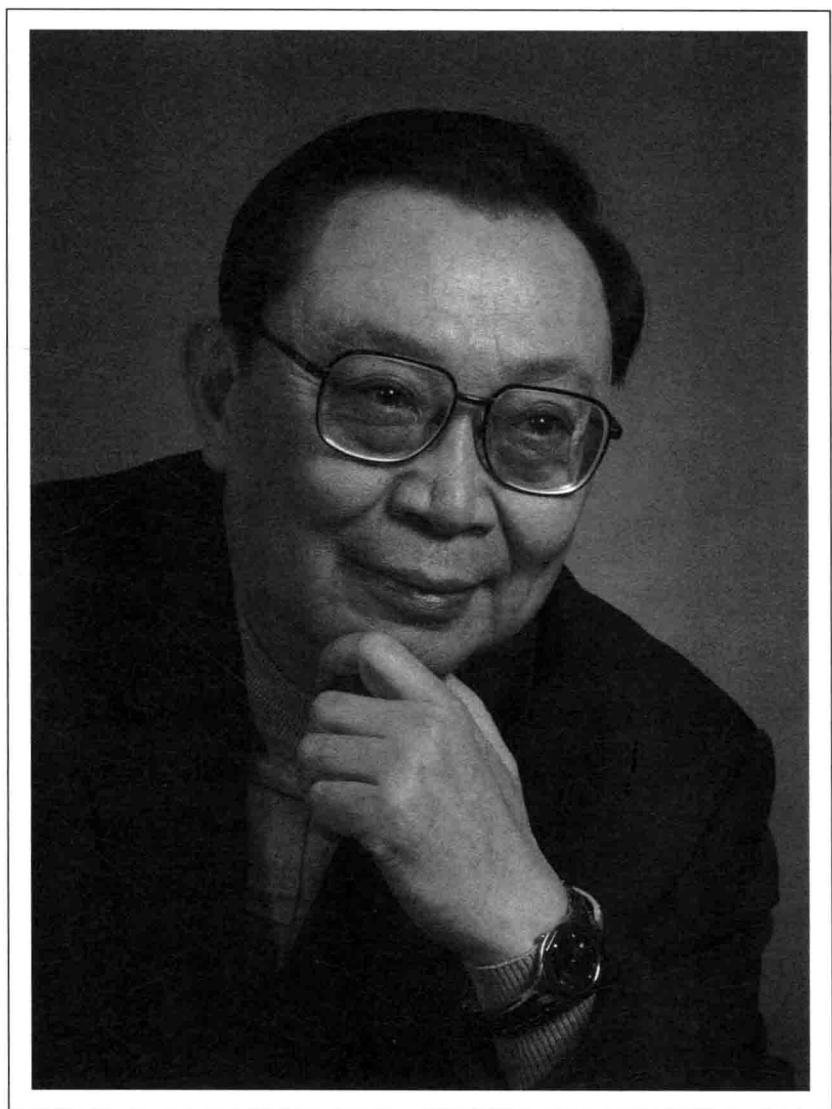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循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它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编 委 会

2009年11月



陶西平先生

难忘的教育生涯

那是 57 年前，我从大学的课堂踏进中学的教室，给孩子们上了我平生的第一节课。那是一节历史课，我记得是讲三国的历史，为了讲得生动，我还专门准备了草船借箭的故事。结果，不到 20 分钟备课的内容就讲完了，我站在讲台上不知还要干些什么。我就是这样尴尬地开始了我的教育生涯，那时，我刚二十出头，并不懂得教育的真正意义。

如今，我教过的第一个班的学生，都已年过七十，我还常会和白发苍苍的她们聚在一起，当她们深情地谈起当年那段学习经历对她们一生的影响的时候，我才更深地懂得了这就是教育。

我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担任公务员，但我始终把自己当成教育工作者，别的朋友也把我看成是教育人，这可能就是我一生中最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

是我的工作经历在我的心中铸下了深深的教育情结。我曾经在小学和中学工作过三十年，教过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政治，担任过班主任、教导主任、校长。我担任中学校长的时候，也还兼着高三的语文课。当我被调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时候，我上完了一生中在中学的最后一节课，第二天去教育局报到。

后来，我先后担任了北京市教育局局长，主管教育工作的北京市市长助理兼教育局长，分管教育科学文化的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5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副主席。同时先后担任七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青少年专门小组副组长，八届、九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职教学会副会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现在还在担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总督学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名誉会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和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名誉主席。

即使身份变成了公务员，我也一直没有离开教育，只不过从教育工作的办学，变成了教育工作的管理和研究者。

多年来，我主要工作和研究的领域是基础教育，重点研究方向是基础教育整体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以整体优化思想为指导探讨基础教育良性发展的教育思想、教育方式和管理方式，推进基础教育的整体改革。在学校管理与教育评价研究方面，先后进行了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教育评价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区域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教育公平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研究。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方面，先后进行了借鉴多元智能理论、开发学生潜能的实践研究，中学德育研究，可持续发展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和家庭教育研究。此外，还进行了职业教育研究和民办教育研究。但现在看来，我的认识虽然在逐步加深，但总体上还是很肤浅的。

这本文集选编了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后，我担任北京市教育行政领导工作以来，发表过的有关教育问题的文章和在一些关

于教育问题的会议上的讲话，时间的跨度将近 25 年。

二十多年在教育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但是这二十多年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气势之磅礴，成就之辉煌是历史上少有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和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一样，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新的课题。因此，每前进一步都会遇到新的挑战，而迎接了一次挑战，也就为迈出下一步铺下了一块牢固的阶石。教育就是这样，永远充满着无穷的困惑，又永远充满着无穷的魅力。

我从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经历了新中国教育的几乎整个求索历程。无数坚忍不拔的教育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在一条坎坷的创新道路上前进。他们善于发现问题，也善于提出解决所发现的问题的办法，因此，教育始终在不断进行改革之中，也始终不断取得创新的成果。教育创新已经成为教育事业发展的不竭的动力。

但在推进教育改革的过程中，也会在注意一种倾向的时候忽视了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这样就造成了今天的改革方向，明天却可能变成改革的对象。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我读到了巴班斯基关于教学过程整体优化的文章，他的追求教学工作的质量和效益的统一，亦即教学过程整体优化的思想，给我很大启发。我想我们的教育事业不就是充满着提高全民素质与培养优秀人才的统一，积极发展与均衡发展的统一，继承传统与推陈出新的统一，规模与质量的统一，投入与效益的统一，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的统一，知识与能力的统一等诸多理想的追求，从而要求实现整体优化吗？

我想到企业界流传着的一个“穿越玉米地”的故事。那是说，有一些人进行穿越玉米地的比赛。比赛的要求是看谁穿越得最快，看谁在

穿越的过程中掰下的玉米最多，还要看谁被玉米叶划破的伤口最少。那就是要求所有的参赛者都要兼顾速度、效益和安全。

于是，我开始感到，教育改革当然是针对教育的偏颇，但最终不只是为了这种偏颇的消失，还要尽力防止新的偏颇的出现。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是由若干个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制约的因素组成的系统，这些因素的矛盾运动促成了教育的发展。教育改革的过程正是不断推动这些相关因素由不和谐达到和谐的连续过程。

这也使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推进教育事业发展进程中始终坚持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理解。于是实现整体优化的思想逐渐地成为我思考教育问题和参与教育实践的哲学基础，并指导着我对教育整体改革的探索。

教育整体改革就是要使改革的阶段性目标服从于教育事业的长远目标，教育改革的局部目标服从于教育事业的整体目标，通过教育事业诸多环节的变革实现教育事业朝着既定目标的整体变革。当然，整体改革的协调性并不影响改革的坚定性，整体改革的全面推进也并不影响改革的重点突破，关键在于把握住各项改革的进程必须始终明确它的归宿。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在教育行政岗位上参与了北京市有关整体改革的宏观思考与实践。这本书所编选的文章有一些是那时对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认识和所制定的方针与政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个阶段教育改革的脉搏和脉络，以及留下的问题与思考。

建立和谐社会，是为了实现多年来志士仁人所追求的理想，也是顺应了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潮流。随着我国新的社会利益格局的形成，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呈现复杂和多样化的态势，不同社会阶层和

利益群体之间的存在、矛盾和冲突，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应对复杂格局、理顺社会关系、构建和谐氛围就成为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的理论和实践的重大课题。

和谐的教育既是和谐社会的子系统，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工程。和谐的教育应当体现在为人人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创造良好的条件，提供公平的机会；体现在为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流动拓宽渠道；体现在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的理念作为指导思想，使学校教育在和谐中求得发展，在发展中创造和谐。

基础教育的和谐发展是向公民提供均等发展机会的重要条件，而在义务教育阶段以政府办学为主体的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是满足不同类型人群需要的必要举措，因此，进一步推进基础教育，特别是西部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特别关注贫困家庭、流动人口子女的入学问题，是促进教育和谐的重要任务。而大力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鼓励民办教育形成适应多种需求的办学特色，则是完成办学体制格局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提供公平的就读机会就是提供公平的开发个人潜能的机会，也就是提供公平的发展机会。而公平的发展机会是社会活力与和谐、稳定的源泉。

从全民学习、终身学习作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理念的提出，到学习化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理念的提出，都突出了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学习对发展的重大作用。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之间的和谐相处，需要利益的合理协调，需要通过沟通增强理解，更需要有相互流动的通道。一旦不同的利益群体形成凝固的格局，则矛盾和冲突就必然会加剧。而最重要的流通通道之一就是终身学习体制的建立。每个人都有继续学习的机会，每个人就都有通过继续学习获得新的发展的机会。因此，教育，特别是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对社会的和谐有着极

为重要的催化和转化功能。我们必须改变对继续教育的种种偏见，进一步加大建立终身教育体制力度。

20 世纪 70 年代终身教育理念的倡导，80 年代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90 年代我国加入 WTO，对我国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新世纪之初，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也同样将对推动我国现代教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推动和谐社会建立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学校教育只有坚持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促进学校的和谐。和谐的学校教育应当是重视全体学生全面素质提高的教育，不应当只重视一部分学生发展而忽视另一部分学生的发展，不应当只重视学生考试成绩的提高而忽视学生素质水平的提高，也不应当只重视学生共性的教育而忽视学生个性的教育。和谐的学校应当是公平的、民主的教育。通过树立干部与教师的以人为本的服务意识，营造干群之间的和谐，教师之间的和谐，师生之间的和谐，以及学生之间的和谐，形成学校公平与民主的体制架构与团结合作的文化氛围。和谐的学校教育应当是开放的、社会广泛参与的教育。通过形成家长、社区和社会的广泛参与，使学校教育把为社会的发展服务与为人的发展服务紧密地结合起来，并在取得家长、社区和社会理解的同时，自觉地置身于其监督之下。

教育战线应当自觉地肩负起为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所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让教育更加和谐，从而使教育成为和谐社会的有力支柱。这本文集的一些文章，是在我不直接担任教育行政领导工作以后，站在立法机关和学术团体成员的角度，对推进教育和谐发展的思考和政策建议。

一般认为，“教育”两个字来源于《孟子·尽心上》，“得天下英才

而教育之，三乐也”。《说文解字》解释，“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但是现代意义的用汉字表示的“教育”一词是怎样出现的呢？前些年，日本教育学会前会长大田尧先生在清华大学举办的素质教育论坛上说，中国使用的不少西方词语都是引入的日本的译法，现在中国的常用词中大约有五百多个都是如此。大田尧认为，许多词翻译得很好，而翻译的最不好的词语之一就是“教育”。我们现在讲，凡是增进人的知识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叫教育，这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教育概念。狭义的教育是指学校教育，是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一定社会所需要的人的活动。大田尧先生对通常的学校教育概念提出了质疑，甚至是很明确的否定。他认为，根本不可能通过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而把他们培养成为你所需要的人，原因在于人总是按照他自身的个性来发展的。因此，他说“教育”这个词翻译得不好。我想这是对教育根本价值的争议。

从教育的发展过程来看，最早的教育论述都是蕴含在政治、伦理思想中的。中国的孔子、孟子、朱熹等教育家的教育观点体现在他们的政治观点和伦理观点，特别是伦理观点之中。古希腊也是如此，从苏格拉底到他的学生柏拉图，再到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等，他们关于教育的思想也是蕴含在他们的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当中的。所以，单独的、成为体系的，特别是成为科学体系的教育学说，在世界古代和中国古代应该说都没有。

一般认为，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叶，教育学科开始成为独立的学科，开始形成独立的教育学。我们通常认为，17世纪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和19世纪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从教育的目的、功能，到教育的组织体系，比较系统地对教育作出论述，教育学开始成

为一个系统的、独立的学科。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教育学自身不仅形成了一个学科，而且开始和其他学科产生了交融，其他学科也介入了教育学科的研究。教育学科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分化，产生了许多教育学的分支，像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史、教育心理学、教育统计学、教育经济学等等。教育和其他的学科交融越多，教育学的分支也就越多，这是科学发展的规律。但教育的悲剧可能也正在这里，越分越细，最终缺乏统一的、系统的思考。

教育本身是个人发展和社会生活延续的手段。教育和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制度、社会意识形态、各种社会实践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还要受人自身的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所以，教育学的发展不是单一学科发展的结果，而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在现实的教育科学研究中也是十分明显的。

教育科学本身所涉及的领域在空间上是广阔的，在时间上是连綿的。因此，我们应该有一个整体观，要认识到，教育的内部和外部、内部因素之间和外部因素之间都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应该有一个动态观，要认识到，教育是与时俱进、持续发展的。纵观几千年来的教育学发展史，从最初蕴含在伦理学和政治学当中，到独立出来形成一个体系，再到形成若干分支，无不是与时俱进的结果。由此可见，教育学是一个有着广泛联系的，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的，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科学。这样来定位，就使得我们不至于简单地把教育只看成是已有规律在实践当中的应用，或者只强调用我们已认识的规律去指导我们的实践，甚至用我们已经认识的规律去否定现在成功的实践。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有一些被实践证明是很成功的、谁都认为是好的东西，但却被一些人用一些已有的学说否定了，说它不符合什么什么理论。我们应该看到，教育学仍然是处在发展中的科

学，教育科学的发展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动摇着已知规律的应用，也动摇着已知规律本身。当然，也有的同志讲教育本身就不是科学，或者说教育最多只是一个准科学，教育的规律可重复的东西不是特别多，或者在重复应用的时候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太多。这种影响就决定了不同国家教育追求的差异性。现在世界各国都在进行教育改革，但是教育改革的内涵和它所追求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同时，各国在教育发展过程中的改革措施也是不断调整的，这种调整与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

现在的教育科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脑科学研究成果和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影响。其中作为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多元智能理论影响到我们的教育观、学生观、发展观。现在的脑科学研究成果否定了过去的许多结论，比如过去我们认为脑功能的发展是受脑生理结构制约的，而科学家近年来在全脑功能开发方面所做的研究表明，人脑中有一部分功能是不会改变的。在此背景下，教育学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明白人有哪些东西是不可改变的，我们不要费劲去改变它，哪些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就在这个领域里发挥教育的作用。

再有，我称之为“基于基因科学的教育学的躁动”。这种躁动可能不是一个坏现象。哈佛大学生命科学院在基因科学研究方面取得很大成就，科学家用一个人的一滴血就可以把这个人的基因排序搞得很清楚。一位中国的学者参与了这项研究。前几年，他来中国跟我谈一个问题，他说，未来的教育学可能要建立在基因科学基础之上。比如人的善良基因和犯罪基因是一对，有的人可能犯罪基因略强一点，有的人可能善良基因略强一点。犯罪基因强的人，童年时代的独立性、反叛性就比较强，如果我们对这些孩子采用压制、打击的教育方法，就会使他们的犯罪基因因受到刺激而更加活跃，这些孩子以后发生犯罪

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另外，现在用一滴血就可以判断一个孩子的艺术潜质，判断他将来是不是有成为艺术家的可能性，这样我们就可以对家长作出指导，以减少他们在教育中的盲目性。所以，要针对基因的不同排序来研究不同的教育方式。当然，我认为科学问题虽然解决了，但是法律问题、伦理问题还没有解决。但不管怎样，我们对人的了解越来越清楚了，将来脱离对人的很多本质的认识来研究教育学是不行的。

还有，对教育的有限效能以及对教育的负效能的关注问题。根据脑科学的研究成果，教育本身的效能是有限的，我们要集中力量使有限效能发挥得更好。对教育效能的研究和对教育效益的研究不是一回事。效能是指目标的达成度，过去我们的效能研究比较多地关注已确定的教育目标的达成度是多少，提高目标达成度的相关因素有哪些，但是对另外一个方面——教育的负效能的研究很少。有人举了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说，在我国革命战争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被授予将军称号的六百多位前辈中，受过教育的不到 1/4，其中很多人大概只达到初中水平。再有，2006 年中央电视台举办了讨论浙商现象的论坛。浙商是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第一批涌入市场大潮做出成就并且走向世界的商人，他们有许多许多的优秀品质。但在论坛结束的时候，人们却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第一批最有成就的浙商，文化程度一般都在初中以下。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革命战争年代冲锋陷阵的那些将军文化程度高的不多，改革开放年代，市场经济大潮到来的时候，下海经商的人文化程度高的也不多，那么文化程度高的人哪儿去了呢？浙江省教育厅的一位副厅长对我说：我们以后可能出现不了像浙商那样的人了，因为浙江省已经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这还真成问题了。一位市委副书记对我说：还真是这样，我们家

三代人都读书，当市场经济大潮来的时候，我们家没有一个人敢下海。这从另外一个侧面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不是念书多了也有负效应，书念多了，胆子就小了。当然，应该说这不是念书的问题，而是我们念的书和念书的方式问题，或者说是我们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有问题，不当的教育本身产生了负效能。许多学校在建校 50 周年或者百年校庆的时候，都要讲我们学校出了多少院士，多少部长，多少领袖人物，他们的身上怎样体现出学校教育的成果，但是很少有人讲我们学校出过罪犯，出过对社会的破坏者，他们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这说明我们对教育的负效能问题研究得还远远不够。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在 2002~2007 年教育部的规划中，对教育目标进行了修正，强调两点：一点是保卫美国国家安全的教育，另外一点是保卫美国民主制度的教育。美国的教育目标和国家的利益紧密相连，教育目标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教育科学始终处在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一点，从而进一步理解教育的使命。

科学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加速，加快了当前教育科学发展的步伐，形成了“学派纷呈，百花竞放”的局面。我到普陀山见到了普济寺的方丈，他一见面就讲：欢迎你，我的同行！我心想：我也不信佛教，怎么是你的同行了？他说，我们都是教育工作者，我也是搞德育的。我一想，他说的有道理。普济寺的方丈是当年主持世界佛教大会的成员之一。于是我开玩笑地说，依您在佛教界的地位，您不但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而且应当是一个教育家了。后来，北京教科院有一位到香港读博士的人来看我，我跟她说了这件事。她给我提出了一个问题：您说为什么耶稣不是教育家？我一听就愣了，是啊，普济寺的方丈都是教育家了，耶稣还不是教育家？她说：第一，耶稣只有一本著作，就是《圣经》，还是别人写的他的言行，他自己没有著作，而教育家必须